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

# 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

〔日〕佐竹靖彦 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

# 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

〔日〕佐竹靖彦 主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日)佐竹靖彦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9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

ISBN 978-7-101-06174-1

I. 殷… II. 佐… III. ①中国—古代史—商周时代—文集②中国—古代史—秦汉时代—文集 IV. 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5994 号

---

书 名 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

主 编 (日)佐竹靖彦

丛 书 名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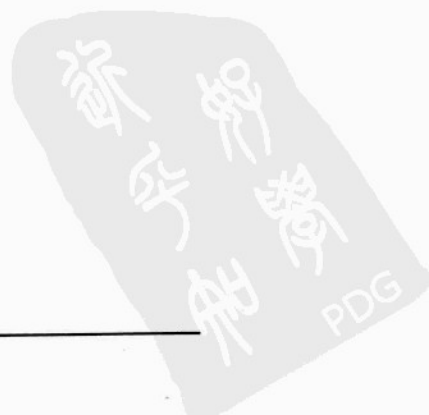
印张 21½ 插页 2 字数 35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174-1

定 价 42.00 元

---



#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汉译本序

佐竹靖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契机下，全球一体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电子网络的发展，将世界各地瞬间连接在了一起。这样，历史研究也可以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来进行了。

与此同时，人类还共同面对着资源、环境、人口等诸多重大课题。这些问题提示我们，当今人类的存在本身就受到了极大的局限，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还包含因可怕的核战争而导致人类灭亡的可能性，事实上是由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

可以说，这些事实昭示了人类正面临某种意义上的落幕。这是否会变成如文字所说的落幕即人类的结束？还是人类跨越这一考验，站在更高的层次迈出下一个历史的第一步呢？这些问题令人难以预测。

面对这种考验，我们能够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重新探索人类走过的道路即人类的历史。

我们作为过去人类存在的结果而生存于今天，如果能够认识过去的我们的

存在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或许对我们的未来能够投下一缕哪怕是朦胧微弱的光亮。而且,构成中国历史的人数如此众多,展开的场面如此宏大,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自然成为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以此为目的,构建一个汇集我们力量的最基础的平台,这便是我们在日本出版《中国史学の基本問題》(《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时的初衷。

问题摆在全人类的面前,我们作为全人类中的一员也不得不接受这些问题。出于这种观念,本书将各论文作者通过各自的兴趣和思考而提出的、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基本问题和思考的问题作为本书的课题,这些问题不应只限于专业课题,还应当使我们的后辈及学生们能够理解。通俗易懂地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的后辈及学生们才有可能理解。他们对这些问题持有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以及通过以此为基础的实践,或许能对当今人类的前进步伐和课题产生一些影响。换言之,本书的直接目的有两个,一是系统地认识各位作者作为专家所理解的重要问题的意义,其次是使其成为能够引发年轻研究者兴趣的入门性读物。

以此为目的所编纂的《中国史学の基本問題》(《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于1996年出版了第一卷《宋元卷》,翌年的1997年出版了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和第三卷《明清卷》,最后于2001年出版了第四卷《殷周秦汉卷》。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丛书在日本出版后不久,我们便着手为出版该书的汉译本而努力,其中的《明清卷》以该卷主编森正夫为主,决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的三卷于2004年与中华书局商定了出版协议。

这样,在该书的出版和此次的汉译,时光流逝,世人目睹了中国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更有了大量的新资料的发现和公开。从这两点来看,可以说本丛书已经稍有些落伍。对于此次汉译本在中国出版,有的学者为此有些顾虑,也有意见认为不做什么修改便发表是不负责任。另外,这套丛书原本是以日本国内的学生及年轻研究者对象而编纂的,完全没有预想以中国本土的研究者作为读者,因此,有的学者对在中国本土出版这种所谓的“内部刊物”抱有消极的看法。

尽管本书的作者们提出的这些看法确有道理,但我们最终还是下决心出版

这套丛书的汉译本。坦率地说,这是因为我们热切希望自己的研究为中国的学者们所理解,或许理解之下会有严厉的反对和批评,我们期待得到各种指教。

虽然日本社会在东亚世界中受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却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当东亚世界受到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时,两国的关系进一步产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这些置身于两国历史关联中的日本研究者,正是希望认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并以此帮助认识日本历史的真实面貌而进行的这项研究,希望中国本土的研究者对在这种历史条件以及我们对此做出的回应和努力下形成的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予以理解,并使我们获得诸多的批评意见,这是我们日本研究者的极为坦诚的愿望。

为此,我们下决心在中国翻译出版这套留有若干缺陷的丛书。为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新资料的大量发现和公开,我们也曾讨论过对丛书加以修订,但最终的结论是我们难以完成如此的工作,所以,本书基本上是按日文本原样翻译成汉语出版的。这样一来,给尤其是因考古学资料的剧增而大受影响的《殷周秦汉卷》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国读者对本丛书以下两点局限予以谅解,一是本丛书在某种意义上有些落伍,二是该丛书原本的设想是以日本国内的青年研究者为主要读者的“入门书”。

同时,我们在本丛书的日文本中汇集了对中国史学之“基本问题”的认识,期待能取得超越某些局限的成果。不论什么时代,基本问题都不会轻易地改变,而且基本问题在初学者和专家之间是共同的。我们由衷地期望这种愚拙的尝试能够得到中国学者们的批评指正,成为确定更具普遍性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步。

最后,想就本丛书日文本的编辑和汉译本编辑之间的若干差异做一点说明。

本丛书日本文的编辑工作是按以下基本方针进行的,即各卷的编委们以其责任编辑为主进行编辑工作,即第一卷责任编辑为松丸道雄、古贺登,第二卷为谷川道雄,第三卷为佐竹靖彦,第四卷为森正夫,佐竹同时兼任第一、二、四卷的

# 目 录

- 殷周春秋史总说 /松丸道雄(1)
- 古代城市社会 /江村治树(20)
- 先秦时期国制史 /吉本道雅(48)
- 周的国制
- 以封建制与官制为中心 /松井嘉德(70)
- 商周时期法制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竹内康浩(88)
- 历与称元法 /平势隆郎(106)
- 中国古代社会与水利问题 /藤田胜久(127)
- 社会史研究与“卜筮祭祷简”、“日书” /工藤元男(147)
- 战国秦汉史总论 /古贺登(166)
- 国制史 /大柁敦弘(185)
- 秦汉时期的财政问题 /山田胜芳(204)
- 文书行政 /永田英正(224)
- 围绕秦汉兵制的若干问题 /重近启树(244)
- 儒教的国教化 /福井重雅(265)
- 汉代国家的社会性劳动的编制 /渡边信一郎(287)
- 秦始皇的思想专制 /稻叶一郎(313)



# 殷周春秋史总说

松丸道雄

假如从本稿所立的题目来落笔,似乎应该从殷代开始,但是根据近年来中国古代研究的发展动向,至少要将视野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后期,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殷代。

新中国成立到今天的半个世纪里,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取得了超乎想象新成果的,可以说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此前,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认识,少得可怜。伴随着新的基本建设,大量考古的新发现,对新石器时代的认识发生了急剧的改变,而维持这项研究的体制得到全国性地协调;同时,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技术得到改良,并且这种技术被广泛应用,其结果是促进了文化编年研究越来越趋向高精度的绝对年代的确定,泛中国的文化变迁观的建立成为可能。其结果是很多“考古文化”在各地被设立,填补了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空白。至少可以看到,试图把这些文化总结为数个“类型”来加以理解。

这项总结新石器时代的工作,虽然只能依靠专门的考古学者,但是,这其中



尤其是近年来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很多规模极大的城墙相继被发现。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进行探讨。

二战前，人们所关注的所谓新石器时代的城墙，只有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这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进行发掘的项目，它的正式报告也在1934年刊行。在这份报告中，断定在那里发现的黄土版筑城墙，早于当时“黑陶居民”的生活垃圾。

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发现了很多龙山文化的遗址，不过由于一直没有发现城墙，到八十年代公开发表了如下的观点：

……一部分人，从墓葬中已经表明阶级分化、以及过去在城子崖发现的夯筑围墙，提出了龙山文化已经有可能进入文明时代的推测。但是，这三十年以来，典型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没有再次发现过与“城”有关的遗迹，没有可以充分证明龙山文化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更为确证的材料。一般意见认为龙山文化仍然是原始社会的末期。<sup>①</sup>

不能否认，这种观点是以中原作为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为基础，或者说对这一结果充满了期待的心情。在发掘河南省登封王城岗和淮阳平粮台的时候，尽管只是发现了极小型的城墙，但还是引起了特别重视，不外乎这个遗址是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原因吧。

但是，进入九十年代，在远离当初所预想的中原地区，如山东半岛、长江中游以及其他地区，陆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大规模的城墙遗址。

来看一下山东半岛的情况。在1996年的时候，有十七座龙山城的位置被标于地图<sup>②</sup>。其中有很多只是根据田野发掘工作，确定其城的所在位置和规模。由于发掘成果报告还未公开发表，尚无法确定这些城址的性质。另外，目前已经明确的龙山城范围以外，这样的城址还有多少呢？或者反过来说，它们是同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关野雄监译《新中国の考古学》（平凡社，1988年，100页小川诚翻译的部分，原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刊行）。

② 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

时并存的吗？每个城又是如何历经岁月，长期被使用的？等等很多疑问，是有保留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但是，尽管如此，因为新出现了过去人们从来不知道的事实，所以在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上，不能不作进一步地深究。

从张学海的论述来判断，我们清楚地知道了这十七座城址的位置和规模。可以明确地分为：济南以西、黄河下游以北有八座（现以 A 群称，见文末图 1, 1~8）；济南以东、黄河以南有四座（称 B 群，图 1, 9~12）；远离黄河的山东半岛，在中央山区部分分布着五座（称 C 群，图 1, 13~17）。这当中的 C 群，由于只知道它们的名称和位置，除此以外得不到任何相关的情报，因此不得不暂时不作讨论。

A 群可以分为南北两组，南组三座（1~3），北组五座（4~8）。张氏把城址面积在数十公顷的定为一级；把数公顷的定为二级。假如依此为标准，南组只有一座是一级（景阳岗城，35 公顷），其余两座（皇姑冢城 6 公顷、王家庄城 4 公顷）为二级；北组中一座（教场铺城，40 公顷）为一级，其余四座尚庄城、乐平铺城、大尉城、王集城，都在 3 公顷的范围里，定为二级。另外在这个范围中，还有很多数千平方米的龙山期的聚落遗址，这些都定为三级。这两组遗迹都是以一级城址为中心，在 20 公里半径的区域里点状分布。

经过这样的分析，张氏认为这个阶段金字塔形的阶级社会结构已经形成，按照苏秉琦的“古文化、古城、古国”<sup>③</sup>的发展阶段模式，应该说已经相当于“古国”的阶段了。

笔者研究过黄河下游南岸的 B 群，一连串排列的城墙几乎都属于一级。从最东面的城子崖城（20 公顷）开始，距离约 50 公里的丁公城（11 公顷）、33 公里的田旺城（15 公顷）、39 公里的丹土城（25 公顷）在一条直线上排列。

笔者曾经讨论过关于殷周时代的国家结构问题，在那篇文章中一方面介绍了学界把这一时代称之为都市国家、邑制国家等几种用语，另一方面也提出了

<sup>③</sup>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

一个从未言及的假说<sup>④</sup>。笔者在甲骨文和金文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在王朝首都“大邑”的下面,存在着从属于他的“族邑”,而在族邑的下面又存在着更多的“属邑”,如此形成累层式的结构。我对于以“邑制国家”来称呼的、其外在的形态上类似“金字塔”型的邑之间的相互关系,充满关注。

而“都市国家”论典型代表的地中海式古希腊都市国家之间,无法想象具有这种金字塔形的累层重叠结构。与上述不同,古希腊都市国家基本上是沿着海岸线或者沿着河道点状发展,“日出走出城堡,行走几个时辰到达农地,又随着落日回到城堡休憩”的生活状态,大致反映了人类一日所能够行走的距离,而古希腊都市国家正是呈现着这样的连锁状态分布开来的<sup>⑤</sup>。

上面所讲到的山东新石器时代城址群中,可以看出 A 群呈层累型重叠结构, B 群则是作连锁状分布。到现在为止,在这些城址中只对很少的一部分做过内部发掘,因此,要判断这些邑所具有的功能和结构、以及在这里居住的人群的社会结构是不容易的;关于这些城邑之间的关系,除了他们的所处位置比较清楚以外,便很难再有更多想象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所呈现的两种形态是否同时并存,就成了注目的焦点,也期待着今后的发掘结果。

与此同时,在长江中下游,发现了稍晚时代的大型城址的聚集区。在长江的北岸发现了三座城郭、南岸发现了四座,其中最大规模的石家河遗址,79 公顷,是山东最大的教场铺城面积的一倍。除此以外六座相对比较小,在 7~25 公顷之间,对此展开过研究的冈村秀典指出,人们只把石家河遗址分为第一等级(大型)、其余的六座定为第二等级(小型)的区分法也许是恰当的<sup>⑥</sup>,但是,如果采用这种标准,那么就与上述山东地区的划分标准发生了错位。另外相对于石家河遗址这个向城内和城外扩展的复合型遗址来说,那些小型城郭的居住区

④ 松丸道雄《殷周国家の構造》(《岩波講座·世界历史》第四卷,古代 4,1970 年)。

⑤ 至今为止仍然不清楚地中海实地状况的笔者,年轻时代对古代都市国家的想象,来自于高中时代一本爱读的书,也是成为笔者从事古代史研究的一个很大契机的,是坂口昂所著的《世界における希臘文明の潮流》(岩波书店,1924 年),第一章“都市国家の盛衰”中所描写的“都市国家”部分。

⑥ 冈村秀典《長江中流域における城郭集落の形成》(《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報》第七号,1997 年)。

范围几乎都被限定在城郭里面。这一点也许跟山东的遗址具有共同的特点。关于城郭的问题将在后面谈的殷商时代,继续展开讨论。

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城郭调查的进展中已经明确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山东城址中的丁公城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片带字的陶片。

毋庸讳言,目前为止公认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也是现行汉字的祖先。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其他的遗迹中,在陶器上发现过类似记号的划痕。而把这些划痕当作文字祖先的研究也不少。但是,符号和文字是有严格区别的,应该说文字具有书写文章的功能。

我们观察到,这块丁公陶片为了书写,制成了很规整的小陶片,并在上面排列了11个刻文。如果说它确实是记录文章的文字的话,那么是可以把文字的起源再推前约800年的唯一例证。但是,尽管多次反复地观察,还是很难把它看作是汉字的祖先。

关于字释,现在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意见。冯时提出可以用中国西南部彝族现在所使用的文字来加以解读这一惊人的意见<sup>⑦</sup>。古代彝字和“夷”通用,如果现在的彝族文字跟山东省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字同源的话,那么,当时夷族的后裔当然就是现在的彝族了。这就牵涉到了现代的中国民族问题,因此,暂且搁置一边。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假定山东的夷族已经使用了相当发达的文字,而那个时候汉字尚没有形成的话(当然这个假定存在着极大的问题),那么将如何看待这以后出现的所谓华夷问题,这将是具有很大启示意义的问题。考古工作者在丁公城内极有限的地方发掘,立刻就发现了这块陶片。过去对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发掘,由于没有在这种类型的城址内进行,因此没有得到相关的文字遗物的出土。我们对比殷代文字的发掘盛况,还是可以充分肯定这样的假设吧。今后随着山东境内多数大型城址的发掘,大量夷族文字发现的可

<sup>⑦</sup> 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另外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也提出了个人的意见,请参考《汉字起源問題の新展開—山東省鄒平県出土の丁公陶片をめぐる一》(《論集·中国古代の文字と文化》,汲古书院,1999年)。

能性极大,并且把这种文字与后代的古彝文作一定程度的比较,是有可能进行解读的。公元前三千年的历史,通过甲骨文、殷墟的发现和研究,也许是再建殷代历史的一线微弱的曙光。这也就是加快对山东古城发掘进程寄予热望的原因所在。

与这个时期比较接近的江苏省高邮市龙虬庄发现的刻文陶片、以及良渚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数件刻辞,可以说几乎都具有类似的性质<sup>⑧</sup>。

撇开民族问题,那么在这个阶段出现文字的本身,自然就引起人们的注目。通常认为在一般的古代社会里,伴随着国家的形成,文字也随着出现。例如, Gordon Childe 在用考古资料来定义古代都市的时候所设立的指标之一便是文字的发明<sup>⑨</sup>。至少在旧大陆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因此,现在很难把公元前三千年后半的这个时期,看作过去曾经认为的原始社会末期,而作为支持这一看法的其中一项指标,当然引起关注。

在这一时期另外引起关注的方面,正如上述所言及的在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的遗迹里出土了风格浓郁的、精巧的玉制品。玉因为其质地优美而备受喜爱。不过这里要探讨的不在其质地如何。由于玉是硬度极高的物质,雕琢玉器既要有极其高度的技术,又需要集约性的劳动,所以,玉器在上述的大型遗址中的集中出现,我们可以想象出玉器的大量存在,正说明了它是与这块地方权力结合的产物,也具有显示支配阶层内部身份标志的功能,也反映了在形成的身份制度中,中间官僚阶层的存在。在这个时期,青铜器尚没有出现。殷周时代青铜器所承负的代表支配阶级内部结构的意义,在早先的这个时期里,则是以玉器的形态存在的。这种理解该不会太偏离吧。

<sup>⑧</sup> 张敏《龙虬庄陶文的发现与殷商甲骨文之源——浅谈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故宫文物月刊》一七三,1997年8月)。龙虬庄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另参见松丸注7所列的参考文献。

<sup>⑨</sup>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1990年,3页。日译:小南一郎、间濑收芳译《中国古代文明の形成》)所引 V. Gordon Childe: *The Urban Revolution,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Vol. XXXI, No. 1, 1950.

总结上文所讨论的几个问题,可以说这个时期原本不该称为原始社会,应该说是向国家形成跨出最早一大步的阶段。如果这样,那么它与殷周时期究竟有什么最显著的差异点呢?令我们不得不探讨这一课题。

可是,这些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突然之间衰退了,或者灭亡了。在山东龙山文化层的上面覆盖着岳石文化、在良渚文化的上层发现了被叫作马桥文化的新的文化层,不过这些文化都没有继承和发展它们先前的文化,而且文化水准都不如前代。这些文化应该考虑在公元前 2300 到 2200 年间。而关于其原因的解释,在今天的考古学者中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比如,俞伟超推测,这是因为发生了“突变”的缘故,而洪水以外的原因很难成立:经历长期的大泛滥,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创造了这两种文化的居民,不得不移居他处<sup>⑩</sup>。而两遗迹的下层和上层,都看不到明显的洪水的痕迹,因此,也有考古学者对这种意见提出疑义。我们关注着这场讨论的结果。

※ ※ ※

其次,关于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迹,由于其关系到“夏王朝”的问题,在此也必须作一些探讨。

从很久开始,中国的学界把“夏王朝”当作实际存在的王朝来看待的,在此前提下的讨论很流行。而日本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比较慎重,王朝实际上是否存在,并不非常积极地加以认可,可以说很多的研究者坚守着这样的立场。日本的许多通史书籍、教科在今天仍然从殷王朝开始讲述是很普遍的。

这与完全否定夏王朝的实际存在并不可同日而语。在半个世纪以前,和田清就曾指出,殷王朝的实际存在被证明的话,那么,留下了许多传说的夏王朝,恐怕也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王朝了<sup>⑪</sup>。而问题在于,能否经受得住历史学的彻

<sup>⑩</sup> 俞伟超著、稻畑耕一郎译《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突然的衰退と变化の原因について》(《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報》第二号,1992年)。

<sup>⑪</sup> 和田清《夏朝は果して実在したか》(《日本学士院紀要》第十卷第一号,1952年)。

底地科学验证,史书中传承下来的内容作为“史实”来接受是否可行的问题。

我们将把这一点,同殷代实际存在的证明过程作一对比。毋庸讳言,在甲骨文发现以前,殷和夏同样完全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而甲骨文发现并且加以释读的结果是,那里记录着很多王的名字,跟《史记·殷本纪》里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同时也证明了《史记》记述的可信性。这就是王国维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但是,关于夏代,至今为止还没有进展。虽然是早就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仍然必须首先加以确认。

尽管如此,中国的学界认为“夏王朝”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王朝,不外乎根据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认为这是一个先于殷的王朝。关于此遗址的年代问题,在第一到第四期的文化层中,长期存在着将第三、第四期当作殷代初期,而把在此之前的第一、二期看作为夏代的意见,以及将整个二里头全都当作夏代的两种意见。而考古学者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后一种<sup>⑫</sup>。而且推测目前已知的、已经发掘的数个大型建筑城址也许就是先于殷朝的“王朝”的中心据点——王都。

但是,根据这些材料就匆匆忙忙地把《史记·夏本纪》里记录的内容,当作史实来接受是否可行呢?站在历史学的立场,我们不得不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所谓“王朝”,意味着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继承性地接受支配权的制度。而《夏本纪》所说的完全符合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夏本纪》中记录的相关王的系谱是否确实是当时史实的反映?还是后人制作后假托于“夏王朝”的呢?最近,从考古学的角度承认“夏王朝”为实际存在王朝的林已奈夫的说法<sup>⑬</sup>引人注目:王国维在他晚年所作的《古史新证》里谈了如下意义的一段话:“司马迁看了‘实录’《世本》以后,撰写了殷周王世系,那个世系是正确的。假如果真的如此(可以说至今未经‘二重证明’所证实),那么,对于夏后氏世系的推断当然也会是准确的。”不过,《夏本纪》中所见王名大都作“帝某”,我们从甲骨文中“帝”

<sup>⑫</sup> 参考小泽正人、谷丰信、西江清高《中国の考古学》(同成社,1999年)146~155页西江执笔的部分。

<sup>⑬</sup> 林已奈夫《中国文明の源流》(讲演笔录)(《出光美術館々報》第一〇九号,1999年)。

字的用法来看,很难考虑当时这个文字有放在王的前面(帝乙、帝辛在甲骨文中也没有)的用法,何况在其以前的时代里这样的命名方式会在当时实行。因此,像王国维所推测的司马迁看到过关于夏代历史的“实录”,它是否真的可以信赖,颇存疑问。在《夏本纪》的开始部分长长记叙的大禹事迹的传说,也是可以按在任何地方的一个传说而已。“夏”的名称在当时是不是就已经存在了呢?它在战国以前是否出现还是一个疑问<sup>⑭</sup>。

就在殷代成立之前,已经存在着作为王都的大型遗址,这一点从考古学角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从其他方面来看,我们能不能把古文献中流传下来的关于“夏王朝”的内容作为史实来接受,“二重证据”的必要性,不正是我们历史学者所寻求的立场吗?

※ ※ ※

至于殷代史方面,最近有了非常重要的发现,经田野考古发掘的结果,已经判明在小屯的对岸有一个巨大的城墙<sup>⑮</sup>。过去一向把这个地区作为殷墟遗址分布区的外围来考虑的。近年来,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与中国展开了共同的调查,结果在这一地区发现了有浓厚前殷墟时代风格的陶片,一时间引人注目<sup>⑯</sup>。此后,随着发掘的继续,最后在洹水沿岸首次发现了巨大的城墙。此城墙掩埋在距今天的地表以下 2.5 米多的地底下,因此长久以来一直未能发现。其规模极大,东西南北四方分别达 2230 米、2200 米、2170 米、2150 米,城墙底部的宽有 9.2 米,城内面积超过 400 公顷。

城墙建造和使用的年代成了争论的问题。根据古文献的记载以及出土陶器器形特征,出现了此城分别属于第十二代河亶甲建都的“相”,以及第十九代盘庚到小乙所立之都这两种对立的意见。

<sup>⑭</sup> 高津纯也《“夏”字的“中华”的用法について—“夏夷思想”の原初の形態に関する序論—》(《论文集·中国古代の文字と文化》,汲古书院,1999年)。

<sup>⑮</sup> 《安阳殷墟保护区外缘发现大型商代城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20日,第14期总783期)。

<sup>⑯</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



如果采用小屯遗址就是殷墟的通常说法,那么,这次发现的洹北商城,即为盘庚到小乙的王城。一直到武丁时期将都迁移到洹南为止,可以被认为在同一个地方。所以,这一发现又被作为后世《竹书纪年》里所说的盘庚以后不迁都的一种解释。

但是,洹水南岸的所谓“殷墟”的形式与目前已知的其他王城有着极端的不同,如果把它当作王城来看的话,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对其中至少一部分持有很大的疑问<sup>⑩</sup>。下面将列出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个思考。

①小屯遗址并非王都址。现在所谓的“宫殿区”在王都的近郊(即北郊),是为了祭日,亦即祭祖的一个特殊的圣地。它被洹水和大规模的蓄水壕沟所环绕成一块特殊的区域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sup>⑪</sup>。

②《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其年数暂且不论,恐怕都是事实。

③根据①和②的情况来看,从盘庚到纣的都城,也许是在小屯以南,与洹北商城一样,至今仍然还被深深地埋在地下呢。相反,只有圣地的小屯是建立在微微的高地上面,因而是露出地面的(《史记·周本纪》的克殷记事里说,存有鹿台的“武王至商国”的“商国”就是指这里“盘庚到纣之都城”。而“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之“纣宫”的所在地,恐怕就是今天的小屯吧)。

④从上面第③加以推论,洹北商城不可能是盘庚~小乙的都城(按照排除法,那么,赞成洹北商城就是河亶甲都城的说法)。

⑤与此相关联,从侯家庄大墓的数字来判断,王城的西北是盘庚以来直到殷末的殷王墓地。

<sup>⑩</sup> 笔者在《再论殷墟卜辞中的田猎地问题》(松丸道雄文,收入《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1996年)中阐述了个人的意见。最近,杨鸿勋有《小屯“殷墟”非殷都之墟》一文,见于《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31日。

<sup>⑪</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91~96页)。同《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77~78页)。根据后者的记录,洹水和“大沟”所分割的范围大约有七十公顷的面积。关于“大沟”所具有的重要性,笔者曾经在四十年前的文章中(松丸道雄《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殷墟发掘简报について》,《甲骨学》第九号,1961年)有所指出。